

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

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贺瑞 李妍蕊

摘要:近年来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。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,流动人口几乎已成为除市民、农民外第三大人口群体。如何引导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,让其在城市定居并完成市民化过程,对当前中国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

关键词: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战略意义

一、文献综述

(一)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定义

社会融合作为社会政策概念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,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·勒努瓦在论文里首先使用了“社会排斥”这一概念。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指出,“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: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,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。Ratna Omidvar认为,社会融合应该拉近互相隔离的人们在空间、社会和经济上的距离。时至今日社会融合并没有统一定义,普遍观点是:社会融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;社会融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;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主观性的融入;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、多层面的。

(二) 国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

在国外,诸多学者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。在移民的融入类型研究领域,戈登的“二维度”划分法认为移民的融入有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。杨格-塔斯等人的“三维度”模型认为移民的融入可划分为结构性融入、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。恩泽格尔等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的融入:社会经济融入、政治融入、文化融入、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。

关于移民在流入地社会面临的社会孤立与排斥以及社会融入限制,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归因理论:人力资本归因论、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。此外国外始终存在同化论和多元化主义之间的争论。

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,按照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。国外对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更多,我国显然是侧重国内移民研究,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,抓住我国流动人口特色进行研究。

(三) 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已有研究成果

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,大多数的城市融合实证研究都纳入了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:前者主要是说农民工生存状态;后者是说的迁移意愿、身份认同、社会地位、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,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和社会满意度等。

朱力认为城市适应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,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,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,而心里和文化的认同才能促使完全的社会融合。他指出,“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同化,它比同化具有更主动、积极的意义。”

社会融合从定义理解,并非单方面行为就可以促成,否则只是“合”而不“融”。如果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,需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。

二、研究方法

(一)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衡量指标

我们参考朱力的见解,认为融合既要考虑物质、社会关系层面,又要考虑到人的精神层面,且以后者为融合的最高标准。因此我们把“是否对城市有归属感”以及“是否对居住区有归属感”作为因变量,以此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上的融入状况。

同时我们认为,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,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并不相同。我们把心理的归属感分为“对居住区的归属感”和“对城市的归属感”,做两个独立模型,然后通过做影响因素对比分析,更全面的了解流动人口融合状况。

(二)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

如朱力所言,社会融合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,所以我们认为,心理上的归属感不可避免要受到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影响。但是我们的考察重点放在融合双方的意愿、能力上,试图从精神、心理等内在层面了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。

在这里主要把自变量分为四类:第一类为个人因素,包括性别、年龄、婚姻状况、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基本情况。个人情况主要反映其人力资本。第二类为迁移状况,包括打工去过的省份、离家外出原因、户口类型是否有过变化、是否希望获得城镇户口等因素。迁移情况可以反映出受访者对于融合的主观态度。第三类为目前工作生活状态,包括居住情况,工作所属产业类型、是否认识小区内邻居等因素。第四类是社会交往层面。首先,融合要考察双方的融合意愿。本文采用“博格达斯主观性社会距离”概念,即可通过测量两个群体之间接触、互动意愿的强弱来测定其社会距离。因此我们需要考察“交友是否考虑本地居民、是否受到本地居民歧视、离家外出是否因为想进入城市”这些因素。其次,双方的社交能力也会对融合有影响,强社交能力者的社会融合状况更好。我们列出受访者日常生活的交际圈,重点考察与本地人的来往状况。再者,受访者本身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关因素。例如在平时是否感到孤独、无助。乐观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是优秀社交能力的基础,而后者对融合很有帮助。

若想作进一步分析,我们可以收集数据构建Logit模型,此文仅作理论推导。

三、结论和建议

促进流动人口融合要实施综合引导政策:一方面要培育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现代市民意识;另一方面要促进群体间的沟通和理解。但最根本的还是户籍、医疗、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、子女教育和住房的改革。只有制度上的革新,才能为融合提供良好基础,为社会和谐、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创造条件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丁开杰,和谐社会的构建——从社会排斥到社会融合[J],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,2005(1)
- [2] Ratna Omidvar. Immigrant Settle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Canada [J].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clusion, 2003
- [3] Josine Junger-Tas, Ethnic minorities, social intergration and crime.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9: 5-29, 2001
- [4] 黄匡时,嘎日达,“农民工城市融合度”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——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[J],西部论坛,2010(5): 29-36
- [5] 朱力,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[J],江海学刊,2002(6)
- [6] 任远,乔楠,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、测量及影响因素[J],人口研究,2010(3)
- [7] 王桂新、张得志,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[J],市场与人口分析,2006(05)
- [8] E. S. Bogardus. Measuring Social Distance.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. Vol 9 (1925)
- [9] 郭星华,社会距离测量及其应用研究[J],广西民族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0(6)

(责任编辑:郭伟)